第三章 一般再生产过程

1. 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是个体资本群体的功能

人类为自己创造了社会生产的机器，作为满足其千百倍需求的一种器官。生产工具——也就是说，集体生产资料——作为一种用来从自然中获取其生存和更高发展所必需的东西工具来为人类社会服务。在制造过程中，生产过程，我们的劳动力和客观的机器本身，都被消耗。这样来看，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是一个资源的使用过程。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被用完的东西在同一个过程中又诞生了：机器、工具和我们的劳动力被消耗，同时又被更新，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生产过程就像人体内的生命过程一样。从自我毁灭到自我更新，以一种持续的、更加复杂的形式：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1

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这段话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生产和再生产是有意识地从这一原则中产生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这一过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完成。再生产的依赖这样的事实：每消费一种产品，一般都必须有一个新的产品取而代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必须对进入生产过程的一切进行精确的核算。无论这看起来多么困难，实际上却很简单，因为一切被用完和毁坏的东西都可以分为两类：*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下，再生产是一种个人职能。每一个资本家，即资本的单位，都要满足自己的再生产需要。资本家要考虑损耗和用完的固定生产资料（机器、建筑物）、流动生产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耗和直接消耗的劳动力。在这些基础上，再加上辅助性支出，如营销成本、保险等，最后资本家带着作为成品的商品进入市场。如果经营成功，那么一个生产周期就成功结束了。资本家现在购买了新的生产资料和新的劳动力，生产又可以重新开始了。由于所有的资本家都以同样的方式行动，结果是整个生产体系连同消耗过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再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系统生产力的提高，迫使资本家通过竞争，把他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投入到额外的资本、新的生产资料和扩大的生产设备中去。其结果是生产储备的增长，包括生产设备的“死”部分和“活”部分。因此，不仅是那些在前一个生产时期被用完和毁坏的生产资料被再生产，而且——用资本主义的有关术语来说——还发生了积累。至于在多大的规模上和在谁的工厂里进行积累，则是个别资本家或资本主义集团的决定，他们的动机是与争取利润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在共产主义下，积累被称为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在这里，市场和将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被消除了，但产品流动仍然存在：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2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3

因此，工业机构将其产品交由社会支配。然而，就后者而言，必须按最初投入生产的数量为工厂提供新的生产资料、原料和劳动力。实际上，如果要实现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向工厂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等要素。然而，这方面的决定权不再掌握在拥有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手中，而是由整个社会决定扩大生产的程度，扩大到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程度。如果说必须向每个工厂提供新的生产资料，其数量与生产中已经用完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同，那么，为了进行再生产，每一个工厂都必须计算它已经以各种形式（也以劳动券的形式）消耗了多少社会产品，这是必要和充分的。然后我们以同样的数量替换这些产品，一个新的劳动周期就开始了。

如果要问，我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每个工业机构所耗费的劳动小时数，那么，现代成本会计学就能提供决定性的答案。由于种种原因，在1921年左右，资本主义的工业积累方法被迫进行了彻底的合理化改革。正是这样，在1922年前后出现了一整套新的文献，内容是发展了为每一个单独的生产过程和每一个单独的辅助劳动功能计算确切成本价格的新方法。这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例如：生产资料的数量、消耗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劳动力，以及每个单独的部分生产过程或特殊的部分劳动职能（如运输、社保等等）的管理费用。但是，它们都与一个共同的要素有关：货币。而工业管理人员认为，正是这一点阻碍了精准的核算。但是，没有什么能阻碍把它们转换成另一个会计核算单位。而且，在社会化生产的条件下，目前形式的公式往往是不稳定的，因为出现在成本预算中的各种因素——例如资本利息——将不再有意义。然而，这种方法本身仍然是一种持久的进步。在这方面，新社会也是在旧社会的子宫里诞生的！Otto Leichter在现代成本会计方面写道：

“资本主义会计控制方法，如果能持续地、毫无阻拦地引入工厂，就能提供准确的数据，显示任何半成品、任何仍在制造过程中的产品的价值，或者精确地指出每一项单独劳动操作的成本。他们可以确定在一个工厂的许多不同的车间中，在许多不同的机器或许多不同的劳动力单位中，哪一个特定的劳动操作可以更经济地进行；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被用来提高生产过程所达到的最高程度的合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会计方法的另一个成果是：每一个大工厂实际上还有一些成本和费用，对可交换的产品没有任何实际贡献。”(这里指的是官员的工资，工作场所的取暖成本等——作者。)“资本主义会计方法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它使这些详细成本得以包含在工程总预算中。”4

2. 公式 (P+C)+L= T. PRD(总产品)

出于这个原因，完全有可能在每一种产品上标明生产它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当然，有些设施不生产有形产品，例如社会和经济委员会、保健服务、教育等等；但是这些设施也同样能够确定它们消耗了多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因此，在这里也可以确切地揭示再生产的成本。如果我们想给再生产下一个简明的定义，那么我们就会说：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生产中的直接操作因素。在与自然的联系中，它们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大量的机器、建筑、食品、原料等使用价值形式的产品。一方面，这批大量的产品以不间断的方式从一个工厂流动到另一个工厂；另一方面，它被消费者的个人需求所消耗。**

每个工厂通过对生产资料(=p)和劳动(=L)的精确核算确保其再生产，这两个量以劳动小时为单位。因此，每个工厂的生产公式表示如下：

p + L = 产品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范畴包括机器和建筑物（固定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原材料和辅助材料（流通的生产资料）。如果现在我们用字母p来表示固定生产资料，用c来表示流通生产资料，那么，公式的形式如下：

( p + c ) + L = 产品

如果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用虚构的数字来代替字母，那么，比如说，一家制鞋厂的生产将会揭示下面的简略公式：

( p + c ) + L = 产品

也就是

（机械+原材料）+劳动=40000双鞋，以劳动小时(L-Hrs)计算，即，

(1250 L-Hrs + 61250 L-Hrs) + 62500 L-Hrs = 125000 L-Hrs

因此，求平均值：

125000劳动小时除以40000双鞋等于每双鞋3.125劳动小时。

在这个生产公式里，工厂同时也发现了它的再生产公式，这个公式表明，为了更新已经用完的一切，必须要恢复多少个代表社会产品的劳动小时。

这个原则适用于每一个单独的工业机构，对整个共产主义经济也同样适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后者只是经济体中在任何给定时刻活动着的所有经济设施的总和。对于社会总产品来说，同样也是有效的。它不过是所有经济机构总和的产品(p + c) + L。为了与单独的工业企业的生产核算控制范围相区分，我们对总产品使用如下公式：

(P + C ) + L =总产品

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工业设施中所有用完的机械（p）的总和＝1亿个劳动小时，原材料（c）＝6亿个劳动小时；如果还消耗了活劳动力的6亿个劳动小时（L），那么社会总生产的简略公式就会如下：

( P + C ) + L =总产品

( 100 M+ 600 M ) + 600 M = 1300 M劳动小时

因此，所有工业设施加在一起，要从社会总库存量中拿出7亿劳动小时的产品来对生产设备的物理部分进行再生产，而工人则消耗6亿劳动小时的最终社会产品。这样，所有生产要素的再生产就得到了保证。

现在让我们特别考虑一下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在我们的例子中，有6亿个劳动小时可供个人消费。不能也绝不可能消费比这更多的劳动，因为在工业机构中，只有6亿小时的劳动时数以劳动券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然而，这与产品如何在工人中分配没有关系。例如，非技术劳动、技术劳动和智力劳动都有可能得到不同的报酬。例如，分配工作可以这样进行：非熟练工每工作一小时按比例获得四分之三小时的报酬，熟练工正好是一小时，官员和领班则是三小时。

3.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所持的价值概念

实际上，经济学家阁下们确实认为应该这样安排分配！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给劳动以同等的价值，也就是说，分配给每个人相同份额的社会产品。当然，这就是纽拉特“不同的生活水平”的意义所在。社会统计学家确定了必要的最低标准，然后使“非熟练的”工人的收入与之相符，而其他人根据他们的努力程度、能力和劳动的重要性获得更丰厚的报酬。纯粹是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

考茨基认为这种报酬上的差别是必要的，因为他认为，对于不愉快的或繁重的劳动形式，同比较愉快的和比较轻松的工作相比，应该支付较高的工资。他顺便说，对他来说，这提供了证据，证明劳动时间核算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同意莱希特的意见，甚至建议即使在每个职业内部也应保留报酬上的差别，因为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考虑到技术工人所需要的额外培训等等，支付给个人的实际工资将不可避免地高于基本工资率(wage rate)。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例如，有观点认为在共产主义经济中应保留工资标准。对此，莱希特十分正确地指出，这并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劳动小时核算的引入，这也可以从我们的例子中看出这一事实。他说：

“存在着纯粹的技术上的困难，这在资本主义下也存在，即为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职能支付的工资必须单独确定，但这与资本主义下使用的方法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复杂之处。”5

我们看到，莱希特认为，不同的劳动评价尺度、不同的工资率的应用，以及同一类型的劳动中确实存在的差异，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然而，这只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社会产品的分配仍然带有对抗性，争取产品分配的斗争仍然在继续。这种斗争实际上只不过是**争取权力的斗争**，而且必须作为对权力的斗争来进行。

没有比上述更明确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些“社会主义者”除了对千百万工人实行统治和支配的形式外，根本无法设想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对他们来说，人类只变成了臣民。他们不过是生产机器的一部分，社会统计学家必须计算需要向这种人力材料提供多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最低生活水平），以保证劳动力能够自我更新。工人阶级必须全力反对这样的观点，并要求**大家**在社会财富中享有同样的份额。

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初阶段，起初可能需要对各种知识分子职业给予较高的报酬；例如，40个小时的劳动可以得到80或120个小时的产品。我们已经看到，这对劳动时间核算方法来说并不构成困难。在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初期，这确实是一种公正的措施，例如，高等教育的手段并不是人人都能免费获得，因为社会还没有在新的基础上充分彻底地组织起来。但是，一旦这些事情得到了安排，那么就不可能再有让知识阶层从业者在社会产品中占有更大份额的问题了。